

不识梅贻琦

2018 年值得记住的一件事,就是看了电影《无问西东》。实话说,是这部电影让我知道了——梅贻琦。而电影迟映了几年,让我晚知道他几年,但一知道,便记住了他。

因为这位寡言的先生说过:“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陈寅恪说他:“如果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像梅贻琦说话那样谨言、那样少,那么这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政府。”这位不像校长的校长又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还说过:“大学教育之重,在于人格。”

因为这位校长用废纸起草公函。因为他没有被称为大师,却为清华园请来了众多大师,还为后世培养了很多大师。因为曾在西南联大读过书的何兆武说他:“每一次警报来的时候,他总是穿一身长衫,拿一根手杖,慢慢地走,而不是(像)有的人一听警报就乱了,就非常之慌乱,就乱跑,他不是。(他是)安步当车地,而且还疏导学生:不要急,这条路窄……”这就是

《无问西东》观后漫笔

■ 罗雪村



(左) 罗雪村画梅贻琦

是先生的斯文!

因为 1949 年,他要离开大陆,学生们执意挽留他,他还是走了,原来他是为了保护清华庚款基金,清华大学建校缘自这笔基金。1962 年他病逝后,人们在病床底下他留下的手提包里看到的,竟然是清华在美国的所有庚款基金账目,每一笔款项都记得清清楚楚

楚,分毫不差。至今,这笔款项仍在为台湾清华大学所使用。

还因为他没有留下什么学说、宏著,可是后人公认:没有他,就没有清华,没有西南联大,更没有在战乱频仍、半壁沦陷下保存了国家的教育元气和一份精神的力量……

我所以记住了他,正是缘于他的言与行。

父亲记忆中的杨钟健

在电影《无问西东》中,听到一个曾经熟悉的名字:杨钟健。

我小时候,住家在中国科学院大院,大院里有大气物理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和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古脊椎所是一座淡黄色三层办公楼,我们一帮孩子老爱去那里玩儿,因为一层有个大厅,趴着玻璃窗可以看到里面一尊巨大的恐龙骨架。在大院里经常能见到一些叫“科学家”的人,像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张文裕、侯德峰等等,他们看上去都是很平常的样子。那时候并不知道他们有多么了不起。还有一位叫刘东生的,住我家斜对面,父亲说他是老西南联大的,搞黄土研究。当时我还奇怪:黄土有什么好研究的?

多少年后,在贾兰坡先生家的墙上,看到一张放大的杨钟健

与步达生、王恭睦、德日进、巴罗博、裴文中、王恒升等人在野外合影的黑白照片,下面一行墨笔字:中国地质学的开拓者。我才知道杨钟健是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古人类学与第四纪地质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1928 年他负责北京周口店发掘工作期间,中国猿人第一颗头盖骨被发现。

年迈的父亲跟我讲以前的人和事,一次,就说起杨钟健。上世纪 50 年代初,我父亲因故去古脊椎所当勤杂工。杨钟健时任所长。“他中等个儿,挺敦实的,不太爱说话,说话有点儿口音。别人说他有脾气,我倒觉得他人还算客气,见面常打个招呼说两句,也许他是出于同情吧。”后来有一天,父亲去地安门偷偷看过杨钟健。“当时他快 80 了,绷着个脸,背着手在小屋里来回溜达。感觉他那时候挺寂寞的。”

现在我还经常回科学院大院,父母亲的老屋还在,但大院早已物人皆非。有时候看着那些从高大簇新的现代化研究所大楼里进出出的年轻人,不由得想:在他们中间,还能走出像杨钟健那样的名家大师吗?

(上接第一版)这是一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著作,更是研究人类信仰的一部巨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巧妙地将严肃的人生哲学和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有机结合在一起,使这部作品成了久传世上的文学名著。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高教部将此书列入大学生必读书目。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窥见上个世纪初郑、耿两位先生决定首先译介这部书的重大意义。

1938 年耿济之抱病完成了这部巨译,1940 年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了上集,赵家璧亲自给他送来了样书,他高兴得在家里小小庆祝了一番。家母在回忆录中说好久没有见到他的笑容了。他的朋友茅盾、郑振铎、傅东华、王统照诸位先生都送来了亲切的贺词。在战火连绵,日伪查禁,出版社纷纷关闭,文学刊物大多停刊的压抑萧条环境下,孤岛上海竟然出版了一部由著名文学翻译家翻译的世界名著,这对中国的文艺界是个极大鼓舞。

这部书的出版可以说凝结了好几位朋友的心血:耿济之坚持不懈的努力,郑振铎的不断鼓励支持,赵家璧和老舍的无私支援,茅盾、傅东华和王统照的鼓舞和关注,这部百万言的浩瀚名著终于由赵家璧和老舍主持的晨光出版社在 1947 年完整出版了。在战事连绵、民生凋敝的年代,出版这样的名著不是一件易事。此时耿济之已经病故两年,生前未及看到全书,实为遗憾。陀思妥耶夫斯基花尽了生命的最后十年写成了这部巨著,耿济之也花尽了生命的最后十年译成出版了此书,这并非只是巧合。我书桌上的这两本郑振铎的藏书见证了他们那一代人为了中国新文化事业锲而不舍的精神。

振铎公公是个大学者,著作等身。前面提到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他同期著作的《文学大纲》就是其中的两部重要的传世著作。他是著名的作家、翻译家、文学史家。中学时期读到振铎公公的《文学大纲》,把我引入了世界文学之林;近几年读了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使我对文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振铎公说:“文学乃是人类最崇高的最不朽的情思的产品,也便是人类的最可征信、最能被了解的‘活的历史’。”文学的“土质是情绪……土色是美……不美,当然不是文学,文学是

产生于人类情绪之中的,无情绪当然更不是文学”。他认为催促我们的文学向前发展不止的重要原动力有两个,就是“民间文学的发展”和“外国文学的输入”。这也是振铎公公毕生在做的事业。他翻译了很多契诃夫的剧作。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和《飞鸟集》也是他最早译介到中文世界里的,并在他的译笔下脍炙人口,流传百年……

个人藏书惨遭劫难,为国抢救珍稀文献

对于读书人来说,最为尴尬痛苦的事情莫过于卖书以换取柴米油盐。而这种事情发生在郑振铎身上不止一两次。抗战时期,兵荒马乱,流离颠沛,生活极其艰难,有段时间郑振铎竟然只能靠卖书来养活自己和家人。他辛辛苦苦收藏的《四部丛刊》、百纳本《廿四史》……都卖掉了。后来他又卖掉了一大批明版书、几百种清代总集文集,使他最伤心的是那部石印本《学海类编》,实在舍不得,但不得不卖了。每本书皆寄托着他“个人的感情。如鱼得水,冷暖自知”。卖书后的感觉真是无可名状。振铎公说:“售去的不仅是‘书’,同时也是我的‘感情’,我的‘研究工作’,我的‘心的温暖’!”“不卖,非饿死不可。卖了,却不断伤心,眼泪只能往肚里倒流下去。”

可是“一·二八”事变发生后,郑振铎宁饿不卖的书却遭到了大劫。他在上海东宝兴路的寓所被日本人侵占,寓所内不及转移的 100 多个书箱被日本人用刀斧斫开,内中两万余册民间唱本全被盗走。“八·一三”战火烧到上海时,余下的 80 多箱书,近 2000 种,包括元版、明版典籍全部失落。最令人痛心的是振铎公公 20 多年来收集的十余箱《诗经》及《文选》、未及刊行的清代文人多部手稿,以及在欧洲收集的文艺和考古学方面的书,全部烬于一旦。

前几年,朱明磊伯母来信告诉我,虽然振铎公公失去了几乎所有的个人藏书,但他曾经组织了一个“文献保存同志会”,从日本侵略者手中为国家抢救下来了数以万计的珍贵宝籍,现大部保存在台湾的图书馆。朱伯母嘱我有机会去台湾时看看。

这让我联想起《纽约时报》畅销书作

家罗伯特·埃德塞尔的历史小说《树立丰碑的不朽英雄们》。上世纪 40 年代,希特勒在欧洲战场上节节败退,发出密令:一旦德国失败或者他本人死亡,必须把在欧洲各国抢夺的所有稀世文物宝藏全部毁掉。于是盟军即刻组织了一支由英法美博物馆艺术家组成的珍宝抢救队,这些人深入敌后,为保护人类文明建立了丰功伟迹,甚至牺牲了生命。书中有这么一句话振聋发聩:“如果摧毁了整整一代人的文化,就好像他们从来没有存在过。这就是希特勒想要的东西,这件事我们不能让步!这是我们的历史,历史是决不允许被窃取、被破坏的。”

而几乎就在同一时期,在中国抗日战争上也活跃着这样一支历史珍宝抢救队。其代表就是学者、文学家、考古学家、收藏家郑振铎。他们于 1940 年在孤岛上海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五个成员是:郑振铎、上海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上海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版本收藏家张凤举。这些学者同样没有使用过枪支,甚至手无缚鸡之力,但他们抱着同样的信念——“这是我们的历史,历史是决不允许被窃取、被破坏的”,在日伪的威胁恐怖中抢救出来一大批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

振铎公公和“文献保存同志会”与当时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朱家骅等人联系,争取到了购买这些珍贵文献文物的资金,通过商务印书馆等处出面鉴定、收购、抢救这些文物。在上海沉沦之前他们把这批珍贵文献运往香港。不料香港沦入日军手中,很多文物又被劫掠到了东京。直到日本投降后,1946 年这批文物才归还给了当时台湾的“中央图书馆”。今天的台湾珍藏着当年“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下来的善本古籍,这是世界上中华古籍藏书最多的书库。在善本方面,有约 12300 余部,近 126000 册,其中包括敦煌写卷、宋本、金本、元本、明本、钞本、稿本、校本等等。

郑振铎和他领导的“文献保存同志会”功不可没,他们是树立丰碑的不朽英雄。除台湾外,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图书馆里也保藏了大量郑振铎保护下来的国家珍宝。

上海孤岛时期,郑振铎和好友耿济

之、赵家璧、梅兰芳、王统照、周予同等人一起经历了非常艰难的岁月。有人劝振铎公公和外公耿济之去重庆大后方,外公身体不好不能成行。振铎公公也坚持不走,他对外公说:“我不能走,我有东西在这里。”他指的就是那些抢救下来的国家珍宝。他们隐姓埋名,每天生活在日本侵略军的威胁恐怖之中,外公的家被日军抄了两次。后来在振铎公公的建议下,外公在善钟路(今常熟路)开了一家蕴华阁旧书店,帮助专事收购珍贵线装古书。这里也是他和振铎公公等朋友相聚议事的地方。书店取名“蕴华阁”,“蕴华”是振铎公公夫人高君箴的字号,意味深长,蕴藏中华文化之意也。外公起早摸黑,在那个只有一个店员的小书店里还继续着他振铎公公年轻时的初衷,译完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部长篇名著。

我的书架上还保存着清末民初的《芥子园画传》(李笠翁先生论定版)两集,儿时外婆用来嘱我临摹学画之用,原有三集,一集后来遗失。家母说是振铎公公在上海孤岛时期留在外公处的,可能和那时抢救古书之事有关。振铎公公当时为《芥子园画传三集》写的题跋道出了当时危难的境遇和他的心情:

余于劫中先后得彩印本程氏墨苑、十竹斋笺谱、画谱,今又收得此本,龚氏四种。二十余年,求其一而不能得,不意于此二三载中,乃并获之,不可谓非奇缘也。收异书于兵荒马乱之世,守文献于秦火鲁壁之际,其责至重,却亦书生至乐之事也。彩印版画尚有风流绝畅图、殷氏笺谱、萝轩变古笺谱诸书,均流落扶桑,何时能或一睹欸?大地黑暗,圭月独悬,蜚居斗室,一灯如豆,披卷吟赏,斗酒自劳,人间何世,斯处何地,均故不闻问矣。幽芳居士书。

振铎公公,这位肩负着保护中华民族文化历史使命的“幽芳居士”,在那样危险的黑暗大地上居然还如此淡定、幽默,保持着天生乐观的秉性。

“为有直肠受臧否,岂无白眼看沉浮。买书贪得常倾篋,下笔浑如不系舟”,茅盾先生对郑振铎一生的评价,道出了一个活生生的爱书、读书、著书、译书、护书,正直、率真的振铎公公。他视书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书和他相伴了一生……